

戴燕

随笔

转见千秋万古情

——关于岩波书店版《杜甫诗注》十册

从2012年起,陆续收到从岩波书店寄来的吉川幸次郎著、兴膳宏编《杜甫诗注》,到2016年整整十册,相当壮观,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杜甫《越王楼歌》里的“君王旧迹今人赏,转见千秋万古情”(《杜甫诗注》第十册),而对这部大书的编著者产生敬意。

在吉川幸次郎看来,以注释的方式向自己崇敬的诗人表达心意,是中国一种重要的学术传统。他尊杜甫为“唯一的诗人”,念大学时读杨伦的《杜诗镜铨》,很快就能背下一百首杜诗。二战期间,他和大山定一等几个朋友组织了一个“读杜社”,共同研读沈德潜的《杜诗偶评》,1944年发表了他第一篇关于杜甫的文章《樱桃》。战争结束后,他以为日本的情况就好比杜甫在安史之乱中所写“国破山河在”,心有戚戚焉,从1947年起,便在北京大学开始讲“杜甫研究”专题课,1950年出版了《杜甫私记》第一卷。他认为杜甫的诗,从30岁以后一直到去世,始终都在变化,读杜诗,应该要知道杜甫的行踪,于是将杜诗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杜甫44岁以前,主要在长安生活的阶段,其次是他遭遇安史之乱,开始流浪生涯,直至48岁前的阶段,再次是他55岁前,在成都过着短暂的平静生活阶段,最后是他离开成都,漂泊于夔州(奉节)及鄂、湘,至59岁去世的阶段。《杜甫私记》第一卷写的是第一阶段,安史之乱前,杜甫作为诗人崭露头角。1965年,在结束了繁忙的教学和公务之后,他才又接着发表《杜甫私记》的续编,也就是在这时,他开始拟定翻译和注释全部杜诗的计划。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出版全部杜诗的计划,当时只有铃木虎雄的《杜少陵诗集》(1928-1931年)与查赫(Erwin von Zach)的德译本(1952年),2016年又有川了字文本的《杜甫诗》英译本。吉川认为铃木虎雄受仇兆鳌《杜诗详注》的影响较大,他还有可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1967年退休后,便全力以赴地在他的书斋“笈杜室”里完成二十册《杜甫诗注》的计划。他还同田中谦二、福永光司、川胜文雄牵头召集了一个“大读杜社”,

同时与京大一些研究生又组成了一个“小读杜社”,定期讲读杜诗,在大小两个读杜会上,都是由他拿出自己的译注稿作为讨论的文本。

1977年,《杜甫诗注》第一册“书生之歌上”由筑摩书房出版,到1983年,陆续出版的还有第二册“书生之歌下”、第三册“乱离之歌”、第四册“行在所之歌、归省之歌”、第五册“侍从职(左拾遗)之歌”,囊括了杜甫47岁前的作品,但吉川幸次郎却在1980年罹患癌症去世,二十册的出版计划便搁置下来,一晃就过了二十多年。2008年前后,参加过“小读杜社”的吉川的学生兴膳宏也从京都大学退休,又从京都博物馆馆长任上退休,筑摩书房原来的编辑大西宽抱了吉川的遗稿来给他看。当年,是吉川先用毛笔写在特制的和纸上,经大西誊写一过,交给内田文夫去核对征引文献,然后再请作者释疑并最后定稿的。兴膳宏说他看到尚未出版的第六至第八册原稿,很多都已经吉川幸次郎过目,便不忍心耗费了这么多人心血的《杜甫诗注》,就这样半途而废,压在箱底,于是在2009年出版了《杜甫——超越忧愁的诗人》以后,下决心接手这些遗稿,给以整理和补充,使它们“复活”。这样才有了岩波书店在五年之内顺利出版的《杜甫诗注》十册。

岩波书店版《杜甫诗注》的第一至第四册,大体遵从筑摩书房版原貌,只是在词语注释方面,有兴膳宏做的一些补充。第五册原来就是在吉川去世后,由小南一郎等整理出版的,为了保存著者遗稿的原貌,筑摩版故意留下不少空白,而这一次的岩波版,则由兴膳宏给以补充完善。第六册至第八册都是兴膳宏在吉川未定稿的基础上增补修订的,增补大约占了原稿的四分之一。吉川的遗稿中,第九、第十册所存都不多,第九册尤其少,其中翻译和注释基本上都是由兴膳宏来完成。自2012年起,兴膳宏也发起了一个“读杜新会”,来定期讨论这些译注稿。他为《杜甫诗注》做的增补修订,在岩波版中也有标记。

正如《杜甫诗注》前五册,新增的第

六至第十册也都有各自的标题,分别是“教育长(华州司功参军)之歌”、“甘肃之歌(上、下)”、“成都之歌(上、下)”,表明该册所收杜诗大概写于什么时期。吉川幸次郎认为要真正读懂杜诗,首先要了解杜甫的生平和时代,所以,《杜甫诗注》虽然是选择了《宋本杜工部集》(《续古逸丛书》本)为底本,却因考虑到编年和诗体这两个因素,又和底本的排序不完全一致。例如第一册“书生之歌”(上)选的是杜甫44岁前的古诗,第二册“书生之歌(下)”选的是他同时所写律诗,这就和底本的卷次不同。各卷中的诗,也主要是依时间排序,并非全照底本。而这也可以说是《杜甫诗注》的第一个特点。

《杜甫诗注》第一册有吉川幸次郎撰写的《总序》,除此之外,每一册还有“提要”和“后记”(仅第三册缺)。提要交代该册的内容,包括所收杜诗的写作时间及时代状况、所用底本等,例如第一册就介绍杜甫是一个“倒霉书生”。提要至第五册都是吉川幸次郎所写,第六册以后为兴膳宏撰写。后记则一律为兴膳宏所写,交代每一册的编纂情况。正文由杜诗本文、训读、翻译、解题、注释、双声叠韵这几部分构成。解题主要介绍与该诗相关的背景、版本(含历代注释情况),与萧涤非主编的《杜甫诗集校注》(2014年)相比照,也可见它有自己的特点。例如第一册所收天宝三载的《赠李白》,就不同于萧本题解的简明扼要,而是增加了很多细节,像引“最近出版的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又说像此时李白44岁、杜甫33岁,杜甫在诗中称李为“韦左丞”、高适“高三十五书记”,都是加官衔,只有对李白称“白”,表达友情更加直白,而杜甫一生中写到李白的诗也大约有八首。这些信息,对普通的日本读者应该都非常有用。

在注释方面,《杜甫诗注》也很有特点。吉川幸次郎认为杜诗有“诗史”之称,是因为诗人对自己的时代极为敏感,通过杜诗,也可以看到唐代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因此,在例如上述《赠李白》“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的注释中,他除了说明“东都”即唐都洛阳,还介绍长安到洛阳的距离相当于东京到名古屋,洛阳在唐开元年间有1183093人、194746户,并有十公里左右的四方城墙,有宫殿及103个坊巷。而在注释“机巧”的时候,他则是引了《文选》所收江淹《拟张衡传》的“胸中去机巧”并李

善注中提到的《庄子·天地》篇“抱瓮灌畦”的故事,同时引李白写给道士元丹丘的“长剑归来,相逢洛阳陌。陌上何喧喧,都令心意烦。迷津觉路失,托势随风翻”,说明李白如何厌倦了洛阳充满机巧的生活。在这里,也可以看到《杜甫诗注》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非常强调杜诗与《文选》的联系。吉川幸次郎认为杜诗在风格上迥异于《文选》,不过《文选》却是杜诗重要的“营养源”,这是因为杜甫的老师李邕正是《文选》注作者李善的儿子,李邕也曾协助他父亲为《文选》做注,因此可以想象杜甫对《文选》非常熟悉,从他在写给儿子生日的诗里还要求儿子“熟精文选理”,也可见他对《文选》相当重视,而基于这一点,吉川幸次郎和兴膳宏也都特别注意杜诗对《文选》中诗文语词的袭用。

《杜甫诗注》的注释与传统的训诂有所不同,重点不在字词,吉川幸次郎认为字词只在字典里,并不存在于实际的话语,因此他的注释往往是以句为单位,相当于串讲,更注重对诗句的理解。而为了让普通日本读者都能够欣赏杜诗,在注释和日本传统的训诂之外,他还加了对杜诗的现代日语翻译。吉川幸次郎说自己受中国学界影响,总是力求用文学的语言去写学术文章,兴膳宏也说他这位老师的文风极具特色,体现在译注中,也可谓“吉川节(调)”,滔滔不绝。而在《杜甫诗注》刚刚面世时,日本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加藤周一便称赞它“不光体现了学术积累,其畅达明快文字,也表现了日本文学传统在现代的复活”。因此可以说虽然《杜甫诗注》采用的是传统的注释方式,但骨子里面却有很强的现代学术精神。

2012年,为了纪念杜甫诞辰1300周年,岩波书店首先推出《杜甫诗注》第一册并刊出前八册的广告,广告中说等到第一期十册刊行后,将会发布第二期的预告,那时谁也没有想到第二年,兴膳宏就摔伤了颈椎神经,手脚麻痹,在医院躺了大半年,到今天仍在艰苦的康复训练中。2015年,我在京都旁听过几次“读杜新会”,在往往连续三四个小时的讨论中,听他一字一句读他自己打字印出来的译注稿,每一次都给我留下他是在拼尽全力的印象。2016年第十册出版,恰逢他80岁寿辰,祝寿会上他告诉大家,他将第十册起,把杜甫离开成都后写的诗再一点一点做下去。与兴膳宏在京大共事过十八年的川合康三说他很佩服这位老学长的一点,是他肯下力气,将老师和老师的老师的遗稿收集整理出版,前有铃木虎雄的《骈文史序说》、小川环树著作集、福永光司的《庄子》,后有吉川幸次郎的《杜甫诗注》。也许兴膳宏身上真的有一种精神,即强烈的责任感或者我们平常说的义,使他刻苦完成吉川幸次郎最初设想的二十册《杜甫诗注》的庞大计划,而这种责任感,在当今社会已经是越来越难得见到。

施康强

笔记

《都兰趣话》的翻译预设

每篇或者每部文学作品,都是由内容和形式构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内容构成所谓的思想性,而吸引我们去读文学作品的,主要不是作者企图传达的思想,而是其表现形式,即艺术性。小说作者讲故事,读者期待自己被吸引,获得某种美感,乃至艺术享受。

我们读翻译的诗歌或小说,同样期待,甚至要求产生与原文读者同样的获得感。巴尔扎克的《都兰趣话》(Les Contes Drolatiques;直译应为《滑稽故事集》),是他作品中的另类,模仿拉伯雷的语言,讲那个时代的故事,他由此创造一个特殊的语境,让法语读者觉得好像回到十六世纪了。那么,如果译此书为汉语,理想的目标应该是让我们也似乎感到超脱现代汉语语境,进入某种古意盎然的境界。

于是我需要在汉语小说中寻找一个大体上类似的语言模式。我想到的是明清话本。一是时代相近,二是当代读者在理解上没有隔阂。基调定下来,下面的事情就好做了。用字造句,力求接近那个时代的市井话语。最好的样本是冯梦龙的《三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和《醒世恒言》。



每个故事的标题,篇名,亦尽可能做旧。长的篇名不好处理;短的,倒是有下手的余地。凡是讲故事,古人喜欢用“记”字做篇名。于是本书里有《斥夫记》《蓓特悔罪记》《弗朗索瓦一世节欲记》《三香客失言记》《茵佩莉娅夫人良记》这样的标题。

边译边乐,边乐边译。将近结尾,第五卷有一篇《关于儿子、爱情和母亲的韵文故事》,我索性拟古到底,译成五言古诗。至此,总算功德圆满,造了一个语言上的假古董。

刘铮

西瞥记

法郎士的悲观

在新出版的“周越然作品系列”《文史杂录》里有一篇《帽不离头的文豪》,讲的是法郎士。文中提到,记录法郎士言行的书居然出过好多种,“法郎士的轶事,讲述者共有五人:(一)白乐生(即他的书记),(二)葛师鲁(Gsell),(三)赛谷(Segur),(四)高飞克(Goffic),(五)商榷时(Shanks)。最后者——商榷时——是美国大学教授,生平没有面过法氏,但是他的著作倒是顶好,顶完美。”

老辈闻见之广,令人倾服。这五位里,我只读过前三位的著作。第一位白乐生,即白罗松,施康强先生译过他的《法郎士私记》,收入“海豚书馆”丛书。第二位葛师鲁,他的《法郎士语录》,我有法文版。第三位赛谷,先是写了本《法郎士谈话集》,后来又出过一本《法郎士谈话二集》,后者我读的是英译本,改题《法郎士识见录》(The Opinions of Anatole France)。

赛谷在序言里着意讲,法郎士对世道人心一直抱悲观态度,马齿渐增,而悲观情绪益甚。但赛谷觉得,法郎士的悲观,理据充足,目光深远。《法郎士识见录》里有一节,叫“进步之缺陷”,便能反映法郎士思想的这种色彩。

那是1919年7月的一天下午,法郎士对赛谷讲道:“我们不必厚赞进步。再说,谁敢啊?无论如何,我都不信的,因为我热爱光,即便光线强到有摧毁力量的地步。”但是,他说,现在他能理解勒南对下一代人的那种疑虑了。勒南认为,无知肤浅,正在威胁世界的未来。勒南人到暮年,看出一种普遍的堕落使得人类文明趋于渐灭并非毫无可能。“他是言过其实了。我呢,可能也有些言过其实。然而,我们没法不同意

首先考虑书名怎么译。我认为冯梦龙的旨趣在于讲故事,道德说教只是他在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采用的一种叙事策略,门面话。拉伯雷和巴尔扎克更志不在此。他们玩世不恭,表面看来满篇荒唐话,不妨译作《玩世戏言》。然而,这毕竟是一本外国故事集,不能太本土化了。总得多少带点洋味才行。于是另找出路。我读巴尔扎克此书,感到十分有趣。灵机一动,何不译“滑稽故事”为“趣话”?可是“趣话集”不像一部短篇小说集的书名。想起读过一本清代拟话本小说集《西湖佳话》,由于拉伯雷、巴尔扎克都是都兰省人,都兰又是书中不少故事发生的场所,不妨又冠以地名,译作《都兰趣话》,提醒读者这里讲的是外国故事。确如祖师爷复所言,“一名之立,旬月踟蹰”。

于是我需要在汉语小说中寻找一个大体上类似的语言模式。我想到的是明清话本。一是时代相近,二是当代读者在理解上没有隔阂。基调定下来,下面的事情就好做了。用字造句,力求接近那个时代的市井话语。最好的样本是冯梦龙的《三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和《醒世恒言》。

每个故事的标题,篇名,亦尽可能做旧。长的篇名不好处理;短的,倒是有下手的余地。凡是讲故事,古人喜欢用“记”字做篇名。于是本书里有《斥夫记》《蓓特悔罪记》《弗朗索瓦一世节欲记》《三香客失言记》《茵佩莉娅夫人良记》这样的标题。

边译边乐,边乐边译。将近结尾,第五卷有一篇《关于儿子、爱情和母亲的韵文故事》,我索性拟古到底,译成五言古诗。至此,总算功德圆满,造了一个语言上的假古董。

陈子善

不日记

《外套》情谊



到了《外套》。而且一提再提:

我到广州,是第二年——一九二七年的秋初……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本书,是布面装订的素园翻译的《外套》。我一看明白,就打了一个寒噤:这明明是他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莫非他已经自觉了生命的期限了么?……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晨五时半,素园终于病歿在北平同仁医院里了,一切计划,一切希望,也同归于尽。……我只能将一本《外套》当作唯一的纪念,永远放在自己身边。

这两段文字写得极为沉痛,不能不令人动容。其实,在现存鲁迅藏书中,有二本《外套》。一本即蓝色布面,书名烫金的《外套》,系1929年4月再版特装本,在此书前环衬左上角有如下题字:

鲁迅先生惠存:
素园敬赠,囑
霖野代题字
二九年七月十二日

对这本特装本,鲁迅日记有明确记载,1929年8月3日日记云:“收未名社所寄《四一》共五本,又精装《外套》一本,是韦素园寄赠者。”两年半之后,鲁迅又在环衬右下角用毛笔题词:

此素园病重时特装相赠者,岂自以为将去世耶,悲夫!越二年余,发篋见此,追忆之。三十二年四月三十日,迅。
落款还钤有“鲁迅”阳文名印,郑重其事。鲁迅在他人赠书上再题词,目前所知仅此一次。又过了两年两个月,鲁迅写下《忆韦素园君》,题词中的意思在上引第一段中几乎重复一遍,足见他对于韦素园早逝之悲痛。而另两本《外套》中,一本即初版本,前环衬也有作者题字:

鲁迅先生:
素园于北京
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鲁迅何时收到这本《外套》,日记中并未明确记载。但鲁迅1926年10月7日致韦素园信中说:“承给我《外套》三本,谢谢”。10月6日日记中又有“下午收北新书局所寄书籍四包,又未名社者一包”,可以确定他是1926年10月6日收到韦素园寄赠刚刚出版的三本初版《外套》。那么,《忆韦素园君》中把收到《外套》初版本和再版本的时间混为一谈了,或许鲁迅为了修辞需要这么写。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篇感人至深的纪念文字的理解。

日前有幸得到《外套》再版本,始知此书初版再版均为毛边本,都印了1500册,封面则由画家司徒奈设计。此书最后一页还钤有带花饰的椭圆形蓝印:“北平马神庙山东街未名社出版部”。于是就把鲁迅与韦素园围绕《外套》的情谊作了一番考察,写下这篇小文。



顾铮

非专业眼光

格罗庇乌斯拍摄的熨斗大楼

1928年,包豪斯设计学校的创办者瓦尔特·格罗庇乌斯(1883-1969)与夫人艾瑟有一次美国之行。此行他们游历了纽约、芝加哥、底特律、洛杉矶、华盛顿与大峡谷等地。作为一个来自旧大陆的建筑师,新大陆的一切都很新鲜,用照相机记录旅行所见也很自然。在现今留存此行档案中,虽然绝大多数照片是艾瑟所摄,但也有几张明确注明为格罗庇乌斯拍摄。

在这张照片中,作为纽约著名地标之一的熨斗大楼,被格罗庇乌斯以对角线构图加以框取。这样的处理,既克服了取景框的限制,也充分突出了此建筑的巍峨感。而被他纳入画面左下角的屋顶,则是用来衬托熨斗大楼之高。

更令他没有想到的是,1934年,为避祸纳粹,格罗庇乌斯先遁走英国,后又于1937年最终定居美国,并且出任哈佛大学建筑系主任。也许,1928年的美国之行,已经为他此次的选择做好了某种心理上的准备。

陆蓉蓉

望野眼

东城

寓居北京,住在东城,窗下就是一条胡同。某日起兴,自东四九条起徘徊散步。九条小学为晚清贝子奕谟府故址,今止有一亭仍存,余皆废。校舍如火柴盒,也不讲配色,突兀可厌。据查此地名人故居相望,今或沦废无可观,或为富家购去,门户深关,不能再窥颜色。

七条有一家种花,五色斑斓,都是平常品目,偏能生机勃勃,已很不易。早过了立冬,菊花还健壮,团团如拳,只是初开。种花的手上不闲着,脸却却过去,和抱狗的邻居谈着天。见我好奇凑上来,也不撵,只是笑。花儿果然要认真调护——公共池内诸位都不好。天气渐冷,一串红垂头丧气,秋海棠瑟缩欲死。只有玉簪仍是轻肥故态,叶缘微黄,残星数点坠在梢头。

树可观,好在树极佳。榆、枣、银杏、国槐都常见,五叶地锦已翻红,欲窥绿意几不可得。演乐胡同九十二号小院儿,今止有一亭仍存,余皆废。校舍如火柴盒,也不讲配色,突兀可厌。据查此地名人故居相望,今或沦废无可观,或为富家购去,门户深关,不能再窥颜色。

有位阿叔打着电话走过,一口京腔砸在地下嘎嘣脆:“别他妈废话,我告诉你赶紧爬起来!”——大中午的,这是教训儿子呢?萧疏如此,欢意盎然。到处老婆闲汉谈天聊地,身躯久久不动。买煎果子一枚,渐渐行近灯市口,遂往中国书店去,装线书都在架上。如今书签是钢笔细字。目力不济,呆站良久也看不清。玻璃柜子里也有书,自咸同以后古书,以至种种民国新文学刊本。十年冷淡,如今更甚,只羡慕全套现代平装本北京古籍丛书。柜员坐在书库前边,看看虚空,看看我。阳光撩起空气里许多浮尘,空寂又凌乱。不知何故有点儿恼。折身出去,走向了稻香村。